前　言

《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一书的写作，从 1997 年初夏就开始，整整经历了一个寒暑，现在总算完稿了。当我写完最后一章书稿时，觉得意犹未尽，还有一些话要对读者说。

首先谈谈写作本书的原旨。这本书是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丛书的一部分。有关共和国史的书籍已出过不少，但都以政治史为中心，分章节叙述，有关重大事件，尤其政治史以外领域的大事，总嫌语焉不详。非人力不逮，因碍于体例。鉴于此，丛书编委们另辟蹊径，把近 50 年的历史拆开，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五部分，各选其大事要事，分卷叙述。本书参列其间，是为外交卷。

虽为外交卷，并不想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更不愿把它写成一本外交政策文献史，而是把那些对中国发展乃至国际政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藉以纪事本末体手法，详述其来龙去脉。尤其着眼于发掘一些重大的外交内幕，即它的历史背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互动过程、决策考虑及其实践效果，以叙为主，略加点评。为此，作者广为搜集、发微勾沉，运用了迄今所能看到并可以使用的材料及国内外研究成果。写作中，以我为主，同时也用较多笔墨分析了对方。外交是一种互动，知彼才能知己，只有作双向研究，才能了解事情的原委和真谛。为了面对专业以外的广大涉猎者，本书力求文笔流畅，文气顺达，避免了大量引述，省去了引文注释，这给专业读者，带来了诸多不便。凡事不能两全，只好抱歉了。虽然如此，作者的严谨态度谅能体察。所叙各事，皆有所据，宁缺勿滥，不作无根据的揣度，更戒演义。至于历史本身的空白，只好把遗憾留给自己，把希望寄予将来，有待更多的历史档案的披露了。

其次，着重谈谈本书的基本思路。本书选择的 19 件大事，不是任意而为。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每个问题虽独立成篇，却都围绕一条主线，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对外战略谋划。

不谋全局，无以谋一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具有全球观念。中国的对外关系都是在一定时期的对外战略指导下展开的。

战略者，全局性谋划也。所谓对外战略（或国际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实现对外目标的全局性谋划，是驾驭国际关系格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变化的一门艺术。

战后以来，国际格局为何物？概言之，就是东西方冷战的两极体制。其中又以美苏对抗为核心。其间 50 年，世界风云变幻、分化组合，尤其是第三种力量的崛起，推动着世界向多极化演变，但直至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轰然崩塌之前，始终没有摆脱这种战后体制，没有走出冷战阴影。

新中国建立昭始，正逢冷战对峙走向白热化。此后 40 余年，始终面对着一个美苏对抗的国际环境。或者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威胁，或者受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视，或者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中国的对外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处理同美苏两国的关系。从 1949 年至 80 年代末，中国领导人曾经有过 4 次对外战略的抉择和演变，这既是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作出的反应，也是对国际环境特定的主观判断的结果。其实质是利用国际矛盾、借重于某种国际力量以增强自己的安全地位，谋求中国的国家利益，又避免受制于美苏两大国的任何一方，在国际事务中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

（一）

50 年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是“一边倒”，即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形势下，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其实质是联苏抗美。这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根据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作出的第一次对外战略的抉择。

从理论上讲，建国之初的对外战略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事实上，中国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倒向美国？决不可能。能否像印度独立后宣称的那样奉行中立政策？国内外都有这种善意的建言。然而，事实上也不可能。中国与印度尽管都是新独立的落后大国，但两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社会意识形态有重大区别。印度可以相对置身于两强争夺之外，中国不能。无论美国或苏联都不把印度的中立政策视为自己的威胁，中国若奉行此道，则将有腹背受敌的可能。既不能消除来自美国的威

胁，又可能引起来自苏联的猜忌。新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需要寻求国际盟友，在国家重建和发展中，也需要寻求国际经济援助，在冷战对峙的环境中，这种支持和援助，惟有从苏联可以得到。

从实践上看，50 年代中苏结盟至少得到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安全上的，一是经济上的。1956 年 9 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同年 12 月，毛泽东在全国工商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说：“中国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替我们设计过。”

还有一点也许被忽视，正是实行了“一边倒”方针，使建国之初在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切断旧的屈辱外交的脐带方面，获得了主动权，减少了外交纠葛。而且，顺利地从苏联人手里收回了东北地区属于中国的各项主权利益。倘若不是中苏结盟，苏联能否如此痛快地放弃它在东北的权益，还当另说。

中国与东欧国家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之中，但各自的地位是不相同的。中国不是苏联的“卫星国”，没有参加类似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集团。中国的外交一开始就坚持了独立自主，

国防和军事指挥权更不容他人染指。50 年代，中国外交的基石是巩固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但并不受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限制，而是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十分重视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特别是与邻近的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对西方阵营的国家也实行区别政策，争取在“和平”和“贸易”这两点上同西欧和日本建立某种统一战线。

中国外交当时“一边倒”的同时，甚至并不排除与美国建交的可能性，只是想把建交日期推后。然而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之间走上了尖锐对抗的道路，美国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变本加厉，中美建交成为不可能。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希望从英国开始改善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因为中美对抗，没有取得预期进展。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发出的同美国坐下来谈判的和解姿态，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谈是谈了，但当时的美国看不起中国，它可以与主要对手苏联讲“缓和”，而对中国的政策却十分僵硬，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并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三个方向对中国构成包围之势。这迫使中国在 50 年代后期采取了强硬的反美策略。50 年代中美尖锐对抗的局面，并不是建国前夕，中共宣布“一边倒”方针时所预期的。

任何结盟都不是无隙可击的。联盟内，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联盟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差别、矛盾和冲突，盟国之间经常存在的“被抛弃的恐惧”和“被拖下水的恐惧”，基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外政策的分歧等都可能导致联盟的削弱和决裂。

中苏结盟也难以超脱这种规律。所不同的是，中苏结盟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基于国家利益的共同点，还以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为纽带，在国家关系之外还有党际关系，中苏两国领导人既是盟友又是同志。这种密切的关系似乎可以使结盟更加牢不可破，其实恰恰相反。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一国的国内政局和内外政策的变动，都会波及他国，因此，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共同协商和协调行动的要求，形成了一个中心、一种战略、一种模式的普遍观念。然而，联盟越是强求一致就越易走向瓦解。在这里，意识形态不再是联盟的粘合剂而是腐蚀剂，任何分歧一旦变成“主义”之争，就难以弥合了。

（二）

60年代初，毛泽东确立了一条反对“帝、修、反”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其核心是同时反对“美帝”和“苏修”。这是对6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全面恶化作出的激烈反应。

60年代，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是中苏分裂、中美对抗、中印交恶。毛泽东的判断是，“帝、修、反”掀起了反华大合唱.

中苏分裂已是不可挽回。中苏之间的分歧，基于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关于前者，在中苏结盟的主要基石——反抗美国——问题上发生了策略上的分歧。苏联致力于美苏缓和，它与美国讨价还价的主要资本就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因而容不得不同意见，采用各种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对于中国炮击金门、中印边境冲突、发展核武器等主权范围内的事进行无理指责和遏制。中国从自己的国际环境和认识出发，坚持不妥协的反美斗争方

针，认为苏联超越中国同美国搞缓和是谋求美苏共管，损害中国乃至世界革命的利益，尤其对苏联企图压服中国感到屈辱，奋起斗争。关于后者，在世界形势、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上发生了原则分歧。中国视苏联为“修正主义”，苏联指斥中国为“教条主义”，双方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和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事实上，意识形态之争背后都隐含着国家利益的冲突，所有源于国家利益的矛盾都披上了意识形态外衣。在国际共运传统中，“修正主义”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

关于 60 年代的中苏分裂，邓小平 20 多年后已作过结论。1980 年 5 月，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原则。”1989 年 5 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对于他自己参与其事的中苏大论战，他评价说：“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他又说：“从 60 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中苏分裂，本来为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自 50 年代以来美国追求的对外目标之一就是离间中苏。然而，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尖锐对峙的集团政治的存在，已使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十分僵化和失去选择性，中苏分裂的不可避免，美国已经注意到，但它得出的政策结论是：拉苏联来对抗中国。在它看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更加不守规矩，中国是“好战的、侵略性的国家”。从遏制中国的“扩张”，防止多米诺骨牌倒塌的错误判断出发，在越南战争中

越陷越深，中美之间在印度支那方向再次走到战争的边缘，中美缓和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

毛泽东提出“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还有其更深的理论依据。首先，他认为，在美苏之间，存在“两个中间地带”，一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国家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并日益发展为与美苏相抗衡的独立力量，这正为中国寻求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其次，美苏两国既强又弱。美国是最强的又是最弱的，它控制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动弹不得，并不可怕。苏联的日子也不好过。美苏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孤立中国的政策也行不通。其三，按照阶级分析法，虽然出现了“帝、修、反”反华大合唱，但真正反华的是它们的统治阶级，只占人口的 10%，90% 的各国人民包括美、苏、印等国人民是不反华的。因此，中国并不孤立。

在“反帝反修”战略指导下，中国在两个领域拓展了外交空间。一是加强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继续稳定四邻，解决了同周边国家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打开了在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外交局面。从 1960 年 7 月到 1970 年 12 月，中国先后同 23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60 年代的第三世界外交经受住了“文革”动乱的考验，正是它的成功推动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进程。

二是推动中国在第二个“中间地带”寻找同盟军。通过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方式加强了与日本的接触；支持西欧联合自强的趋势，尤其支持戴高乐的法国政府的独立倾向，从而使中法建交，在中国与西欧的冷战屏障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毛泽东的性格是不怕鬼、不信邪，压力越大，反抗越力。由此，锻造了 60 年代中国外交不畏强暴、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形象，加上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独立斗争的始终不渝的支持，赢得了许多国家尤其是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敬佩。中国打破美苏的核垄断政策，独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迅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正视中国的存在，不得不考虑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从以后的形势发展看，中苏两党分家，对于中国的独立发展并非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与 50 年代初不同，60 年代的对外战略不能认为是惟一可能的选择。其中也折射了日益升级的“左”倾错误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反映在中苏论战中中方发表的系统观点之中。60 年代初，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向中央领导人进言，主张调整对外策略，缓和紧张局面。认为，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强调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不要过分突出强调 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忽视世界和平运动的意义；在国际斗争中应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不能一斗到底；避免把美帝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要设法打开中印关系僵局；对外援助应量力而行，不乱开支票。王稼祥的进言是策略性的，其要旨正如他所说，是要谋求和平和有利环境，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国内建设。但他的建议遭到否定，随后又作为“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纲领被批判。

中国对外战略中超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因素在这一时期逐步上升，即存在一个世界革命的长远目标。当时，一面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估计过重，一面对世界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

观。在中国承担的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义务中，既有反帝反殖的内容，也有世界革命的内容。

不过中国遵守了一条戒律：革命不能输出。支持主要是道义上的，只要不危及中国安全，就不出兵。言词激烈，行动谨慎。1965 年 1 月，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即便如此，过激的意识形态限制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余地，对世界革命的过分强调，在一些已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引起了猜忌，而在“文革”中唯我独尊，“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中国失去了结交更多的朋友的机会。到 60 年代末，中国真正面临了来自美国和苏联两方面的战争威胁。美苏两国先后都动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念头。

（三）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是“一条线”反霸统一战线，其实质是联美抗苏。这次战略调整具有实质意义。如果把 60 年代的“两条线”战略视为过渡性选择，那么从 50 年代的联苏抗美到 70 年代的联美抗苏，正好来了一个颠倒。这是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环境作出的重大选择。

60 年代末，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实力由顶峰走向衰落，迫使它着手调整其全球战略，采取收缩政策，有退出越南的打算，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在减

少。苏联则相反，趁美国深陷越战的机会，发动攻势，加紧扩张军备。美苏全球争夺中渐显苏攻美守态势。对中国，自 60 年代后期起，尤其从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以后，苏联不断增兵边境，陈兵百万，构成对中国的严重现实威胁，中国确认，主要威胁来自苏联。要改变安全环境，除加强备战外，在当时，突破口只能是缓和中美关系。

美国尼克松政府终于从中苏分歧中看到了自身利益之所在，认识到中国作为一支独立力量不可忽视，希望通过中美和解帮助美国体面地从越南撤退，同时利用中苏分歧获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基辛格的均势战略理论支配了美国对苏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解冻正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契合。

毛泽东“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反对霸权主义又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及其指导思想——关于“三个世界”理论，不仅是他对战略力量的重新配置，而且表明他观察世界的基点已发生重大改变，意识形态考虑退居次要地位，国家利益首先是国家安全利益居于首位。这是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让步。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是严格的阶级分析法，联美抗苏更是超越了意识形态。

不管联美抗苏“一条线”战略是否就真的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这一战略指导下的中国外交的最大收获是，使中国对外关系在 7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首先，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结束了中美之间“20 年交恶”的局面，虽然美国在走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有些犹豫，但最终由于对苏联扩张的共同担心和遏制苏联的共同战略利益，推动了美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卡特政府下决心接受中方的建交原则。中美正式建交并且随之形成了一种不是正式结盟的战略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解冻，直接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同西欧各国关系的全面突破。在广大第三世界中，原来与美国有条约关系、或与西方有历史渊源、或接受美国援助、或受到美国压力、或对中国有猜疑的一些国家，排除了障碍，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70 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从 1970 年至 1980 年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 56 个猛增到 124 个，遍及全球各大洲，同时期，中国进入了联合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排斥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的局面最终被打破了，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里就已经打开，中国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可谓妙棋一着，全盘皆活。

然而，中苏双方都为采取尖锐对抗的方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代价。当时中国对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估计过于严重，以至于把国内工作推向了备战轨道，精神上处于临战状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大战，保持了很高的战备水平，军队数量达 500～600 万之众，国防预算占财政支出的 1/4，耽误了历史发展的机会。在全球推行“一条线”和“一大片”反苏统一战线战略，也遇到了不少困难。虽然对苏联的共同担心促使中美两国走到一起，但恰恰在如何对付苏联问题上中美有战略分歧，中国关心的是国家安全，主张联合抗苏，美国关心的是全球均势，与苏联既争夺又合作，在与苏联的讨价还价中玩“中国牌”，热衷于“缓和”。中国希望联合西欧抗苏，西欧虽有借重中国之意，但不愿走得太远而得罪苏联，总想“祸水东引”，偏安自保。中国从战争迫在眉睫的估计出发，对于裁

军、对于美苏缓和、对于“欧安会”都持批评态度，认为是绥靖政策，是战争烟幕弹。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美、欧以牺牲中国利益与苏联做交易，以及以缓和掩盖战争危险的担心。

在第三世界，中国宣布自己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外来干涉，维护民族独立，支持它们向发达国家争取平等的经济秩序而斗争的立场，从而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赞誉。唯独在联合反苏这一点上，在第三世界遇到了困难。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对苏联有好感。中国采取“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一些原来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主要在非洲）与中国疏远了，倒向了苏联。第三世界并不是一个利益和意志完全趋同的国家集团，它们面对的环境和对手各不相同。把如此众多和复杂的“一大片”国家纳入一个反苏统一战线之内，是不现实的。 70 年代末，面对苏联的逼人攻势，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一度放在同美、日、欧建立某种战略合作关系上，这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产生了误解，认为中国转向美国，转向第二世界了。这当然是误会。但也说明，与某个超级大国关系过于密切，就会削弱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自主行事的能力。

（四）

80 年代中国再次实现了对外战略的调整。与前三次战略选择和调整不同，这次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以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为主导实现的。这次调整发生在 1982 年中共十二大前后，到 80 年代中期已经完全清晰了。其实质内容就是改变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实行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的完全独

立自主的对外战略。

中国实行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是，自 70 年代末开始，中国国内工作重点已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是和平和安定的周边环境，需要谋求广泛的国际合作者，为此，中国希望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中美关系改善之后，中苏关系的解冻就成为重点。苏联是中国最大最强的邻国，共同边界线达 7000 多公里，朋友可以选择，邻居无法选择。“一条线”反苏战略和联美抗苏，虽增加了安全系数，但无法消除中苏紧张对峙的压力，也无法改善同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其他亚洲邻国的关系，整天处于临战状态，中国就无法集中力量搞建设。

中国领导人看到，80 年代初以后，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它的对外扩张从顶峰衰落下来，遇到前所未有的来自国际、国内和东欧的各种挑战。苏联已不像 70 年代那样富有侵略性了，美国也不像 70 年代那样处于守势。中国面对的苏联威胁不再如 70 年代那样迫在眉睫，也不必担心美苏联合对付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再实行“一条线”联美反苏战略，不仅不必要，甚至会带来新的不稳定，即不仅会继续卷入美苏冲突而失去选择自由，而且可能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只有保持独立自主，才能真正作为大三角中独立一角，发挥战略平衡作用。

从全球形势看，80 年代虽然在许多地区热点频出，动荡不宁，但大战的危险在减少。经过长时间的观察，邓小平得出了一个新的论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个论断的提出，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基本估计，而

且反映出中国认识外部世界的观点已发生重大变化。不再认为当今时代还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不再认为世界大战注定不可避免，不再把动员世界人民准备应付战争、推动世界革命视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当今世界科技突飞猛进，南北贫富悬殊，各国日益致力于发展，世界竞争越来越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和技术领域。这个认识，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中心目标从安全目标转向经济发展的目标提供了更深层的依据。

1982 年前后，中美关系出现磨擦，苏联领导人发出和解信号，为中国着手调整战略，打破中苏僵局提供了契机。中国采取了主动，寻求缓和途径。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停止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内政策的批评，确立了发展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四项原则，不干涉其他党内部事务。从 1982 年下半年起，不再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同时与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的情况下，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在 80 年代末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也随之基本消除，周边环境全方位改善。从 50 年代以来，中国第一次谋得了这样一种局面：避免卷入两强之争，同时与美苏保持良好关系。这是这次战略调整的重大成功。

这次调整的另一个成果，就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形象更加鲜明，中国的外交更加走向全方位。在中国的外交中，美国因素或者苏联因素都大为减少。中国宣布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定亲疏，不再“以苏划线”或“以美划线”，更加有利于同所有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以苏划线”，使一些与苏联关系友好，或不愿卷入中苏争吵的国家解除了误会。与美国适当拉开距离，使中国获得了对美苏两国霸权主义行为进行批

评的更大自由。中国更加明确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斗争，不论它们的斗争锋芒指向那个霸权主义国家。积极支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展开的斗争，推动和参与“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

中国外交的另一个全新领域，是日益广泛地参与联合国事务，开展多边外交。70年代，中国由于国内不稳定，也由于对联合国事务不熟悉，在联合国对一些重大问题主要限于原则表态。进入80年代后，中国对联合国的作用和活动作出了更加积极的评价，对联合国事务采取“积极主动，逐步深入”的方针。中国意识到，国际社会日益相互依存，联合国作用日益增强，地位不可替代。中国先后参加了联合国属下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出席了各种国际会议。在各项活动中，不再限于原则表态，也不一味说“不”，而是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目标出发，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的立场。在反对侵略、消除地区热点、推进和平进程、实现世界裁军、参加多边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等方面，中国都采取了进取的态度，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只有到了80年代，才能说，中国真正融入了国际社会，中国经济也日益广泛地融入世界大潮之中。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战略格局发生历史性演变。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冲击，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应对方针，强调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反对霸权，但不当头，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这些策略方针是种理性的现实主义的选择，使中国稳住了阵脚、经受了考验，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中国外交没有受到外部的挑拨，坚持了自己的既定轨道。历史再次表明，80年代的外交战略选择是成功的。

（五）

建国50年来，中国对外战略几经演变，从总体上说是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回应。相对于主权国家的内政，外交受到的客观制约更严格，选择的余地相对较小，一定时期面对的国家体系和国际格局是无力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外交战略选择无得失之辨。国际环境既是客观现实，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主观认识和政策运用的产物。政治策略和艺术可以在外交领域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从50年代的“一边倒”，60年代的‘两条线”，70年代的“一条线”，到80年代的“不结盟”，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日益走向成熟的过程。

80年代的对外战略，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基本原则，同时表现出许多新的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它倡导一种超越冷战思维、超越意识形态、超越集团政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主张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所有国家间的关系的通行准则；它更加明确地宣布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对国家利益的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明确地把国家利益置于首位，把国家安全置于国家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的基础之上；它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之际，抵御了内外诱惑，宣布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但决不当头，既不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也不当发展中国家的头，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它倡导一种积极参与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